

时安兄：

前天晚上你把30来篇散文稿传到我的邮箱。我当晚来不及拜读，第二天白天有事，到了晚上才打开电脑逐一读来，原来也只是想浏览一遍，但读着读着，竟不想睡觉了，一口气读了下去。虽然老眼昏花，却也津津有味，虽然血压很高，却仍然浮想联翩，连带着对三四十年来种种回忆，你，还有你所写的海上人物。除了沪上画家我不太熟悉，你所写的大多数人物，也都是我熟悉的师长朋友，于是，作者的你，所写的对象人物，还有读者的我，构成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圈，我沉醉在其中。

你说你要把这些文章编成一个散文集，要我为之作序。我没有二话就答应下来，随即把手边的事情都往后推一推，准备先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——也不是你的任务特别重要，而是我的感情特别需要，人渐渐老去，时时会感受孤独感突然袭来，莫名所以。你和我的个性不同，你比较热情外向，而我总是落落寡合，但有些地方，我们的情绪似能相通。譬如你写纪念赵长天的文章，写到你请长天、福先他们吃饭，嫌环境不好，觉得没有吃好，希望再补请一次，但是长天却走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自然想到，2002年，上海作家协会安排我与长天、福先，还有于建明，一起去埃及访问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回来后一直说，大家聚一聚，聚一聚，但总是在这段时间谁身体欠佳，或者那段时间谁又特别忙，总是说，有机会，过段时间再聚，一晃很多年过去，谁也想不到，身体最好的长天竟突然撒手了。这当然不是一顿饭的纠结，而是在我们这段年龄里生命无常的感受特别强烈。还有，你写中学同学昌龙，写到同学中三个人最要好，后来一个被水淹死了，后来又一个患了绝症……这种情景，我在写我的中学回忆《1966—1970：暗淡岁月》里

也有同样的情景，少年时期的好朋友，几十年过去，这个没有了，那个也没有了，不说也罢，说起来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。自前年以来，我周围的许多尊敬的朋友和长辈纷纷谢世，数片落叶而知秋近，孤独的时候，心里总是凉飕飕的。今读你的散文，又勾起我久久缠绕于心间挥之不去的寂寞之感。

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。你与我的心性不同，你要比我乐观向上，你的文字里充斥着热情。你那些记叙海上人物的文章，写作时间贯穿了三四十年，从游戏笔墨到生死以共，经历了漫长的光阴积淀，但一贯的饱含着热情洋溢的精神状态。你在描写你与徐中玉先生、罗洛先生还有赵长天等一起共事的时候，都提到那段曾经被不愉快的世事所困扰的经历，你既坦率地为时代留下见证，也用你特有的奋进态度，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困境里的坚韧与挣扎。你还有一个长处是知足常乐，以平民出身感到自豪，珍惜人生的努力，所以你的文章里始终透彻一种来自民间的朴素哲学：你很少众睡独醒，愤世嫉俗，也很少怀才不遇，怨天尤人，（而这两点，恰恰是当下很多知识分子痼疾）。你喜欢在现实环境中实实在在地做事，对于现实中取得一点成绩，都会由衷地高兴自得。你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编过刊物，后来又上到上海作协、上海文化局、艺术创作中心担任一些领导工作，抓过创作，写过评论，渐渐在工作岗位上成就了一个文艺评论家的功德。人的一生就是这样，有因有果，每一步路都是用自己的脚走出来的，这样的人生就过得踏实。

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

——致毛时安的一封信

■陈思和



毛时安

我读你写中学同学的那篇文章尤其喜欢，文字里就渗透了这种可贵的平民人生观。

我喜欢读你近年写的一组文章，写程乃珊，写赵长天，写贺友直，写罗怀臻，无论写人谈文，都充满真挚情感。一般来说，记人叙事的散文出感情还是容易的，难得的是要面对文字作品发议论，表达出有情有义的态度。你评罗怀臻剧作的文章，达到了这样的境界。作为一个评论家，有时候难免会碍于人情世故，写些遵命而勉强的文字，这时候评论家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度和热度的；相反，当评论家一旦面对与自己生命信息相通、撞击出生命火花的文学作品，他自己的生命热情被激发出来，他的生命信息就会转化为一个个文字，一句句语言，强烈地体现出来。这样的文艺评论才是上乘的评论。你写的《为信仰而创作》，是为《罗怀臻剧作集》写的序文。你与罗怀臻，曾经一个是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，一个是著名剧作家，但更重要的，如你所说，这是“两个挚爱艺术的男人

之间”推心置腹的对话。你对《西楚霸王》《金龙与蜈蚣》《班昭》等一系列作品的评论，虎虎生气，笔底似有神。你从上海文化大背景来高度评价罗怀臻：说他“是一个异类、异质的文化符号，是一个带着苏北文化背景的外来人，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。也因为这个不可捉摸无法预测的异质的文化符号，在后来岁月中像跳动的火焰般地活跃介入，上海的剧坛和文化景观有了别样的生机和活力。”这个评价非常到位。是的，上海的文化不是从先验的模式里发展而来，它本来就是大杂烩，是江南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变风而成。海外西方文化、南洋华侨文化、江浙社会文化、苏北底层文化四大主流，再加上五湖四海的流民文化杂交，终于形成汪洋恣肆的现代海派文化。而罗怀臻的戏曲创作，代表了当下海派文化艺术中最为强悍最有震撼力的硬文化元素。（文化艺术要分软硬之别，如评弹艺术，是软文化之最。）罗怀臻的戏曲剧本虽然雅俗共赏，但硬文化元素则是他在当下靡靡流行文化中脱颖而出、一览众山小的根本原因，然而民间大地的文化元素又是罗怀臻艺术创作的重要支撑。你老兄法眼清静，一言道破罗怀臻艺术风格的命根所在。你指出《金龙与蜈蚣》里，“城市观众看不到自己熟悉的物欲横流的场景，看不到生命萎顿、灵魂苍白的人物。蜈蚣、子叉、玉凤、玉莽，他（她）们渺小卑微，然则他们的生命代代相传。天老地荒，扑面而来的强悍的草莽气息，是人物顽强抗争命运的野草般旺盛的生命力。”你指出在《梅龙镇》里，罗怀臻“对传统题材‘游龙戏凤’的最

大改变，就是强化民间底层生活自在自足的祥和欢乐，用以置换帝王玩弄村姑的腐朽性，从根本上颠覆母题原来的趣味指向。”所有这些评论语言，都洋溢了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量，说到了罗怀臻艺术风格的根本所在，也应和了你

你自己激情澎湃的评论主体性。时安兄啊，读着你这篇《为信仰而创作》，我想得很多很多，这个题目固然是从罗怀臻那里来的，但又何尝不是说破了我们的“信仰”呢？40年前我们意气奋发走上文坛，围绕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社的周围，从事文学批评；30年前我们在《上海文论》上开辟“重写文学史”专栏，后来遇到一些风波，我和晓明，还有你，三人跑到南京一起编完最后一期特辑，从南京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大谈文学与当下局势，旁若无人，不说我们是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”，倒也真有一点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气概。我提到“粪土”也是有原因的，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让我们大笑不止的话，你说：“我正准备端着大粪，朝这帮人浇呢！”——也许你已经忘了吧？但是，要说到“信仰”，我们对文学、对学术、对拨乱反正的虔诚追求，何尝不是“信仰”的操守和坚持呢？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你在作家协会、文化局等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，我仍然在大学里自由自在地教书，我们都是各自岗位上默默履行自己的责任和实践，虽然交往不频繁，但肃肃赫赫，交通成和，彼此都有呼应。这种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几十年，支撑我们走下去的，也无非是那个让知识分子面对风云而从容淡定的“信仰”。

时安兄，我很久没有写这样的文字了，老友面前难免伤感一番。现在你的《海上人物》出版在即，我略写几句，聊以助兴。希望新书早日问世。

在此，祈保重身体，文思旺盛。

思和

于血压奔腾中昏昏书写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《中国的红星》注重红星形象描写。在《称霸洪湖的——段德昌》中，说段“为人彬彬儒雅，容貌白皙，眉目秀丽，望之俨然一翩翩美少年也。若易以女装，混入裙钗队里，直足以乱真。见之者均以为不知谁家少年公子，绝对无人想及其为红军猛将者。”在《青年运动领袖——恽代英》中，描写恽代英演说和写作才能时称，恽代英初到黄埔军校时，“一般学生见恽衣冠垢敝，貌不惊人，目为乡下土老儿，不愿聆彼之讲演。不意恽一上台讲演，即彩声四起。”“恽在广东，因所负职务繁多，故其忙特甚……因此恽对于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等规定之文章，常于午夜瞌睡之际，始奋其天才，振笔出之。如此忙碌之中，往往无暇整容，须发怒张，常如猬猯也。”

《中国的红星》注重红星细节描写。在《广东省委书记——邓中夏》中，称邓中夏“在写文章时，嗜吸纸烟，尝于某晚为《中国青年》写稿，自七时半至夜一时止，共吸去大仙女牌香烟九包，并且只用一根火柴，一时共党中人，莫不引为趣谈”。在《毛泽东的夫人——贺子珍》中，在叙述到长征时写道，红军长征，步行二万五千里，“贺亦随军前进，在战场上曾受伤多次，身上被炸伤达念（廿）的大写——笔者）余处，

满身血迹累累，受伤以后，先由人抬，继由人背，复换骡马驮，最后人马俱无，只得步行，而于此时，又产生一小孩，可谓受尽世间之一切痛苦，然卒不死，而奋斗之火焰亦不稍减退。”这些真实可信的细节，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都会为之动容。

《中国的红星》评价红星客观公允。评价毛泽东：“国共再度合作以后，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开，毛泽东之地位乃更见重要，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属望之第二领袖”，并预料“不久的将来，毛必为中枢重要人物也”。评价朱德：“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在朱德领导之下，参加西战场作战以来，捷报频传，其神出鬼没之游击战，使日军陷入极端困难之地位。”“今后之朱德，恐尚须加一‘民族英雄’之头衔也。”他认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“为最活跃之人物，且为斡旋国共合作之最大功臣。国共再度合作，周之地位，更为重要”。他指出方志敏是“赣东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者，曾任红军第十军军长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，固亦独霸一方之红军英雄也”。他强调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，就和赵世炎、李立三“被称为共党三杰”。“其为人刻苦耐劳，具有锐利的政治眼光，观察一切，异常正确，而办事手腕，尤有斯达林（即斯大林——笔者）之风”。如此中肯，对读者全面

了解红星极有助益。

囿于历史的局限性，《中国的红星》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。再版时担任评注工作的李教授指出：将当时还健在的邵式平、李立三列入“过去的红星”中，显然不妥。红军长征后，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等，陈毅被误为叶剑英。还有将向忠发、王明、张国焘列入中国的红星，也很不恰当。他们三人，“晚节不忠，不足为训”。但我们不能苛求于林轶青先生，更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去对待。

寻找作者

对编著者林轶青的身世，李教授曾做过反复考证，但至今仍不知其为何方神仙？可能是上海的出版商林轶成，但也只是推测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是一名热爱和敬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爱国知识分子。“中国之有红军，前后不过十年历史，但红星之活动，则已近有二十年之久。”可见，他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早期领导人统称为“红星”，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，统称为“红星之活动”。崇敬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为什么要编著这本书呢？林轶青坦言：“此辈红星身世，各各不同，或则出身

富豪之家，或则贫无立锥之地，然既经献身革命，则为主义而奋斗牺牲之精神，殆皆一致。”虽然各位红星结果不尽相同，有的英勇牺牲了，有的还在英勇奋斗，但他们的革命精神都值得传扬，“尤足资为谈助”。然而，在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时期虽牺牲者颇不在少，“复因‘共产’二字，悬为例禁，书报刊物，检查甚严，故虽奋斗至勇，死事至烈，亦莫由漏泄于外。此辈皆一时俊彦，若听其身世湮没不彰，未免可惜。况禁之愈深，则欲知之心愈切。”现在，国共两党，已尽捐前隙，携手合作，同为复兴民族而努力。因此，全国广大民众，“今日翘首延踵”，更都迫切希望知道“此辈红星身世”。为“不佞追念过去，既珍国土，弥怀先烈，实不忍听其此辈毕生奋斗之红星，及身而没，英名不彰于世”。情真意切的语言，鲜明地反映了编著者的家国情怀。

“我们很想知道更多有关林先生的信息，但由于《中国的红星》出版后不久就销声匿迹，林轶青亦湮没于民间，终于成为不可能。”李良明教授不无遗憾地说。“如果林先生或他的同事、后人得知，尘封了80余年的《中国的红星》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再版，将是多大的慰藉啊！我们真诚地借贵报一角，希望知情人提供寻找作者的线索。”